

诗经

朴素的歌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天宇 著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诗经

朴素的歌声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杨天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朴素的歌声/杨天宇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7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ISBN 978-7-5325-4964-1

I. 诗... II. 杨... III. ①古体诗—中国—春秋时代②诗经—通俗读物 IV. I2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5567 号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诗 经

朴素的歌声

杨天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8.6 插页 3 字数 127,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300

ISBN 978—7—5325—4964—1

K·1070 定价: 16.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国学”一词，如果仅按照语词来解释，“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见1999年版《辞海》）。但如将“国学”作为一个体现中国独特而古老文化的专用名词的话，其内涵则历来未有权威的论断。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著名学者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然而，不管学术界如何争议，构建国学的基础为国故，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明确而不变的，那就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我国所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个基础体系如果用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来区分，便是恢弘而灿烂的经、史、子、集四部。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国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被冷落，近来却又以“国学热”的形态兴隆起来。“国学热”，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然而追本溯源，当今的“国学热”与“五四”运动前后对国学的提倡却有所异同。当时“国学”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就此而言，现在的“国学热”与百来年前一脉相承。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国学提倡，更多地体现于严肃的学理、学术层面上，那么当前的“国学热”却具有明显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有其深刻的底蕴：不仅是学术界，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在苦苦地探究，在世界视域的今天，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应向何处去？然而凡

事一经普泛，尤其在普泛以至形成“热”潮之际，便需要一份冷静，以免“热”潮流于浮泛，堕于时俗。在“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潮流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如何走向”的问题。要言之，也就是深化和浅切的统一，就学术层面而言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深化，而就表述手段而言，则要求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的浅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暂不必再就“国学热”这一名称的学理性是否科学聚讼不休；重要的是，须从其社会实践的本质意义，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一方面的营养，来做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作。要言之，有两件事情：

一是精选。即用最小的篇幅，介绍国学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精华。虽然，所谓的“最小的篇幅”只是相对而言，但无论如何，我们这套由三十本左右的小册子组成的“国学基础教程”，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来说，实在是精选到极致了。

二是解读。既用通俗而不失学术内涵的文字来填平横亘在现代汉语和古文之间的鸿沟，更须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作具有世界视域的现代人的解读。

总之，让广大向往国学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更正确地了解国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在初涉国学这座辉煌的文化殿堂时产生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激发个性化的思考，就是我们编撰这套“国学基础教程”的宗旨；而“基础教程”四字，则标志了我们企图将学术性与浅切化统一起来以“提升阅读”的努力。

本《教程》的作者，都是于某一经典有积年研究心得的专家；而同时，我们又请作者或其他专家于各书每一章节的最后，给出一至两道思考题，以期多元化地启发读者在阅读各书内容后，再结合其他知识和当今社会的现状作出自己的思索。这也是我们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这一教诲的礼敬。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了体现国学传统的原味，这套“国学基础教程”也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为四小套。同时为了读者购买和收藏的方便，每套的封面我们也将以四种颜色——绿色（经部）、红色（史部）、蓝色（子部）和灰褐色（集部）以示区别。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我们的发明，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就是这样做的。而经、史、子、集四部的具体内容，则请参见每一分部各书封底的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或“十三经”中，《诗经》是最早被中国古代统治者尊奉为经的一部儒家典籍。

在《诗经》被尊奉为经以前，它的名字只叫做《诗》。《论语》和《墨子》所说的“《诗》三百”，《左传》、《国语》以及先秦诸子书中所谓“《诗》曰”或“《诗》云”，指的都是《诗经》。

西汉时期，统治者提倡儒术，先后把儒家的《诗》和《书》、《易》、《礼》、《春秋》等五部典籍尊奉为经，于是这五部典籍都有了“经”名，这就是所谓“五经”。其中《诗》最早在汉文帝时候就被尊为经了，而《书》、《礼》、《易》、《春秋》都是在汉武帝的时候才被确立为经的。西汉统治者挑选研究这些经的知名学者立为博士官（即所谓学官），让他们招收弟子进行教授，这样“五经”就在汉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诗经》本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选集，其中收集了上自西周初年，下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这些诗歌根据音乐性质的不同，划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又称为《国风》，所收集的是一些地方民歌，共一百六十篇，作者多是一些不知名的民间歌手。这些民歌分别来源于当时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这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因此被划分为十五《国风》。“雅”是正的意思。“雅乐”就是“正声”或“正乐”，这是宫廷和贵族用的音乐。《雅》中所收集的诗，就是配合“雅乐”演唱的诗，这些诗主要是当时贵族士大夫的

作品，共一百零五篇。雅乐有新旧两种。旧有的雅乐比较纯正，称为“大雅”。后来又有一些受了地方民歌影响而“杂以《风》之体”的新的雅乐出现，被称为“小雅”。因此《雅》诗也被区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类，《大雅》三十二篇，《小雅》七十四篇。“颂”本是一种用大钟伴奏、可以边舞边唱的庙堂音乐，配合这种音乐的诗，就称为《颂》诗。《颂》诗共四十篇，都是官僚贵族制作的。《颂》诗又分《周颂》、《鲁颂》、《商颂》三类。《周颂》三十一篇，是西周王室庙堂祭祀的乐歌。《鲁颂》四篇，是春秋时期鲁国宗庙祭祀的乐歌。《商颂》五篇，是宋国宗庙祭祀的乐歌；因为宋国的统治者是商的后裔，所以不叫《宋颂》而叫《商颂》。

汉代研究和传授《诗经》的学者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因此《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之分。《鲁诗》最初的大师是鲁人申培（人称申公）。《齐诗》最初的大师是齐人轅固。《韩诗》最初的大师是燕人韩婴。《鲁诗》和《韩诗》在汉文帝时就立了学官。《齐诗》在汉景帝时立了学官。这三家《诗经》传授时的本子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即隶书写的，所以被称为今文经。这三家学者对于《诗经》的研究和解说，便被称为今文《诗经》学或今文《诗》说。

《毛诗》最初的大师是鲁人毛亨，人称大毛公。毛亨给《诗经》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毛亨传授给赵人毛萇，人称小毛公。河间献王刘德立毛萇为博士，并把《毛诗》献给汉朝廷，但朝廷没立学官，《毛诗》只能在民间流传。《毛诗》最初发现时的本子是用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毛诗》按其篇目一共有三百一十一篇，但其中六篇仅有题目而无诗文（据说诗文已经亡佚了），所以实际有诗仍然是三百零五篇。《毛诗》还有《序》。在《毛诗》每篇诗文前面，都有一句或若干句简短的文字，以提示该篇的诗义，有的还述及产生的背景，叫做《小序》。在《毛诗》的第一篇《关雎》的前面除《小序》外，还有一段总结三百篇创作经验和阐述儒家诗歌理论的文字，叫做《大序》。

三家《诗》和《毛诗》，虽因文字今古的不同而得今文经、古文经之名，但这种区别是次要的，而且《毛诗》在后来流传时也被改写成今文（隶书）了。它们实际是因学统不同、治学的方法不同、对诗的文字和诗义的解释不同而划分的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汉代形成的

今古文两大派别的经学，被后人称为汉学。

今文三家《诗》盛行于西汉，到东汉虽仍被朝廷立学官，但已经逐渐衰落了。《齐诗》在曹魏的时候就亡了。到西晋时期，《鲁诗》也亡了；《韩诗》虽存，已经没有人传习了。南宋以后，《韩诗》也亡了，现在仅存《韩诗外传》，也已经不是汉时的原貌了。相反，古文《毛诗》在西汉虽不被重视，到东汉却盛行起来。当时著名的学者如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研治《毛诗》。郑玄还为《毛传》作《笺》（也是注解的意思）。郑玄的《笺》虽以解释《毛传》为主，却杂采三家今文《诗》说之长，形成了混淆今古文家法的“通学派”，盛行一时。经过郑玄作《笺》的《毛诗》，对今文三家《诗》取得了压倒优势。三家《诗》衰亡后，《毛诗》独传后世。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就是郑《笺》本的《毛诗》。

二

《诗经》本是文学作品。但中国古代统治者几乎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文学作品对待过。《诗经》从周代开始，就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典礼仪式、贵族宴会、政治和外交等场合，并被作为贵族学习的教材。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对人的思想和感情起启发、激发和移化的作用），可以观（有认识作用），可以群（有沟通人的思想感情的作用），可以怨（有讽刺、批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的作用）。迩（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的话，正是对《诗》在周代所起社会作用的概括，也反映了儒家对《诗》的社会作用的看法。

自从汉代把《诗经》尊奉为经以后，这部儒家典籍便成了钦定的政治伦理教科书。汉统治者需要巩固其一统天下和皇权，于是便有鼓吹“大一统”和“君权神授”、附会阴阳五行和谶纬迷信的今文经学出现。当时的今文经学最盛行的就是《春秋》公羊学和三家《诗经》学。但由于今文经学竞相附会、日趋繁琐化和神秘化，致使学者不得要领，甚至皓首不能穷经，这样发展到东汉中后期，已经不能很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了，“通训诂，明大义”，简明易学的古文经学便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盛行起来，于是三家《诗》衰落了，出现了《毛诗》独盛的局面。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国家的动乱、分裂，旧有的统治秩序的破坏，加上玄学的兴起，继而佛教的盛行，于是经学进入了衰落时期。这时的经学仍属汉学系，但汉学中的今文经学已衰微，今古文经学的斗争被古文经学的内部斗争所取代。这种斗争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魏晋时期，主要是郑学和王学的斗争。郑玄打破今古文家法，兼采三家《诗》说以为《毛诗》作《笺》，称为郑学。王肃则标榜纯粹的古文经学，他为《毛诗》作《注》，排斥三家《诗》说而纯用古文说，并攻击郑玄破坏今古文家法。曹魏皇帝支持郑学，司马氏支持王学。随着司马氏在政治上的得势，王学曾一度盛行，但西晋灭亡，王学很快也就失势了。第二阶段，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经学也分裂为南学和北学。北学的《诗经》学墨守郑《笺》，无所创新。南学的《诗经》学则较自由，虽以郑《笺》为本，亦兼采王学和魏晋以来的玄学。隋灭陈统一天下，南、北学也归于统一。但“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反北并于南”（皮锡瑞《经学历史》七）。这是因为南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吸取新的营养，能有所创新，代表了学术发展的主流，也更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唐朝建立后，为加强思想统治，虽儒、佛、道并用，也仍以儒家经学为主。但自汉以来，经学内部有今古文之争，有郑学与王学之争，又有南学和北学之争，众说纷纭，义疏繁杂，各家所据经书在文字上也互有出入，这就使人们莫衷一是，不利于国家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于是唐初统治者下令，组织学者订正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又据《定本》撰成《五经正义》，以统一各家经说。其中《毛诗正义》七十卷，以郑《笺》本《毛诗》为底本，广泛吸收汉魏六朝以来《诗经》学研究的成果，对《毛诗》和《传》、《笺》做了详尽的疏解，是一部汉学《诗经》学的集大成著作。《毛诗正义》被唐朝颁行全国，成为学童、士人和官吏人人诵习的标准读本，并使《诗经》在全国得到空前广泛的流传。

《毛诗正义》既是汉学《诗经》学的集大成的著作，但同时也标志着汉学《诗经》学的终结。因为统治者把它的经文、训诂和疏解规定为唯一标准，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义皆不可变更，这就停止了《诗经》的自由研究，汉学的《诗经》学也就成为僵化而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东西了。所以到宋王朝建立后，充满怀疑精神、主张自

由思考的宋学的《诗经》学，便破坏并进而取代了丧失生命力的汉学的《诗经》学。宋学《诗经》学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南宋的朱熹。朱熹在哲学上发展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思想而建立了理学（即道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就在于把封建秩序说成是永恒天理的化身。在《诗经》学上，他竭力攻击《毛序》，认为“《诗序》实不足信”（《朱子语类》卷八十），主张废《序》言《诗》，说“尽去《小序》，便可自通”，“尽涤旧说，《诗》意方活”（同上）。朱熹在他的《诗经》学力作《诗集传》中，就弃《诗序》而不录，集宋学《诗经》学之大成而作了新解，并把他的理学思想贯串其中。此后朱熹的理学被统治者确定为官方哲学，《诗集传》则成了解释《诗经》的权威性著作。宋学的《诗经》学压倒汉《诗》学而取得了统治的地位。这一统治地位从南宋末延续到元、明，直到清初还有很大影响。

宋学尚思辨和独立思考，其末流则日趋空疏和僵化，变成了只知空谈义理心性而不务实际的无根之学，因此到明清之际，便走向衰落。相应地，宋学的《诗经》学也丧失了它的统治地位。清初以后，取代宋学的，是主张实证的汉学的复兴，称为新汉学。在《诗经》学方面，先是东汉毛、郑古文《诗经》学的复兴，后来是西汉今文三家《诗经》学的复兴。

清初学者如顾炎武等主张对经书作实事求是的切实研究，以期经世致用。他们认为汉代距先秦较近，其经说比较接近古人的本意，所以他们要求“复古”以“求真”，即主张对被宋学排斥的汉学进行学习和研究，研究的方法则是重考据和实证，从而开创了清代的考据学（朴学）。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压恐怖政策，使知识分子不敢谈政治，同时清统治者又用利禄引诱和网罗学者去从事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校勘和编纂工作，以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这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使许多知识分子脱离现实而钻进了故纸堆，造成了考据学的发展。考据学在乾、嘉时期达到鼎盛，而在道光以后走向衰落。考据学派主要是复兴和研究东汉的古文经学，在《诗经》学方面主要是研治《毛诗》学，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清初陈启源积十四年心血、三易其稿撰成的《毛诗稽古篇》，旗帜鲜明地标明以《毛诗》为宗，“诠释经旨，一准《毛传》”（《四库提要》），而把辨正和抨击的矛头指向宋《诗》学，清初学者提倡实

学，批判宋学，“此编尤其最著”（同上）。乾嘉时期，惠栋的《毛诗古义》，焦循的《毛诗地理释》、《毛诗补疏》，戴震的《毛郑诗考证》等等，都是考据学的重要著作。道、咸以后，考据学虽走向衰落，但仍有一些认真治学且很有成就的古文学者，他们接受了乾、嘉学者考据的成果，对《诗经》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疏释。其中最重要的学者和著作，有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

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期，就有一些学者不满意这种脱离现实的繁琐考据的学风，而开始研究今文经学。道光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危机，内忧外患，清代的今文经学派则站到了思想运动的前哨。汉代的今文经学喜谈“微言大义”，正便于他们利用来“托古改制”，探索改良社会的方案。例如龚自珍把汉代《春秋》公羊学派所发挥的“三世三统”说，运用到《诗经》学中，利用《大雅》中的几篇记述周人开国历史的诗和《周颂》中的几篇诗，来宣传历史的发展由乱而治，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以达到“太平世”的社会进化论（《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二》）。但因为汉代的今文《诗经》学早已衰亡，只有片言只语散见于古代的各种典籍中，于是又兴起了对三家《诗》的辑佚工作。其实这种工作从南宋时的王应麟即已开其先河，明清都继续有学者在做，而自道、咸以后，为了提倡三家诗来反对《毛诗》，这门学问便兴盛起来。陈寿祺、陈乔枏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已经遍搜古书。清末民初的王先谦又集前人辑佚成果之大成，撰成《诗三家义集疏》一书，给这一工作打上了一个句号。三家《诗》辑佚学促进了清代今文《诗经》学的发展。道光年间的魏源，利用前人的辑佚成果，撰成《诗古微》一书，就是清代今文《诗经》学的一部发挥微言大义、宣扬托古改制的代表性著作。

清代后期复兴的今文经学成了清末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并与反对维新的保守的古文经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后期今文经学派便渐趋式微，他们的学说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今文学派最后的大师皮锡瑞所著的《经学历史》、《诗经通论》等书，已经不讨论现实问题，不参与政治争论，而成为所谓纯今文学著作了。从此，中国经学的《诗经》学便走向了没落。

三

从上面我们对《诗经》学发展历史的简略回顾可以看出，经学的《诗经》学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紧密联系着当时的政治现实，并为当时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斗争服务的。这一点今文《诗经》学表现得尤为突出。至于统治者怎样把《诗经》作为伦理教化的工具，我们只需向读者举出《韩诗外传》这部书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部书中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系列伦理观念，每一条都是引《诗》为证来加以说明的。

因此，有人批评中国古代的《诗经》学是“封建说教”。但如果我们以此为借口而将中国古代的《诗经》学全盘否定，那就错了。这是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诗经》研究中，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校勘、辑佚，乃至诗的背景和诗义的解释方面，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和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可为今人所利用，或值得今人借鉴，从而使今人对《诗经》的阅读理解和研究有所依傍。否则，《诗经》对于今人，其中的绝大部分诗篇，都无异于天书，不知其所云，而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将在黑暗中摸索。再说，古人利用《诗经》所进行的说教，固然有许多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东西，但其中也有不少合理的因素，能够启发今人深思，给今人以教益。当然，我们不赞成今人再像古人那样对《诗经》作经学的研究，而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文学的、社会学的或历史学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今人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本小书，选择了《诗经》中的四十篇诗（有几篇较长的诗只是节选了其中足以表达诗义的若干章），并通过“述评”，利用古代经学家对这些诗的诗义的解说，结合我本人对诗义的理解，来探讨一下《诗经》和古代经学家的诗说，对今人所可能有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这种写法只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当然，读者如果想了解《诗经》和古代的《诗经》学，并想从中获得教益，最好还是自己去读书。要了解汉学的《诗经》学，古文经学方面可读《毛诗正义》，今文经学可读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要了解宋学的《诗经》学，可读朱熹的《诗集传》。要了解

清代新汉学的《诗经》学，本文上面所介绍的陈启源、马瑞辰、胡承珙、陈奂、魏源和皮锡瑞的著作都可以读。这些书一般部头都较大，读者不必全读，可选择其中若干篇，把几种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著作拿来互相参看，进行分析比较，并可与今人的著作如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进行参看，这样便可从中发现问题，受到启发。还可找一两种关于经学历史和《诗经》学历史的书来看，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本，中华书局出版），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有影印本），今人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出版社）等等，有助于我们弄清经学和《诗经》学发展的脉络，从而加深我们对于上述各种《诗经》学著作的理解。这样坚持下去，渐渐便可入门，进而便可登堂入室，做较深入的研究探讨了。

目 录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前 言 / 3

第一章 婚恋篇 / 1

一、君子求淑女 / 3

二、砍樵哥儿思游女 / 8

三、少女抗婚 / 12

四、男女婚嫁要及时 / 16

五、王姬的美德 / 20

六、弃妇的哀诉 / 24

七、失婚女子的告诫 / 29

八、太子拒作政治婚 / 34

第二章 家庭篇 / 37

一、后妃多子的颂赞 / 39

二、妇人的相思之苦 / 43

三、戍卒爱国恋家 / 46

四、孝子的哀思 / 50

第三章 政风篇 / 55

一、妻以夫荣 / 57

二、俸薄之叹 / 60

三、卫国的复兴 / 63

- 四、诅咒无耻者 / 68
- 五、投少报多的忠厚之情 / 71
- 六、隐含诗中的郑国故事 / 75
 - 七、风雨如晦盼君子 / 79
 - 八、拳拳之心的忧思 / 82
 - 九、号令不时失民心 / 85
 - 十、行役者的思亲之情 / 88
 - 十一、伐木者的愤怒 / 91
 - 十二、对硕鼠的痛恨 / 95
 - 十三、曹国君臣的奢风 / 98
 - 十四、周大夫的遗训 / 101
 - 十五、召穆公的呼声 / 105
 - 十六、劳逸不均之怨 / 109
 - 十七、卫武公的自诫辞 / 113

第四章 用人篇 / 117

- 一、采卷耳与求贤 / 119
- 二、卫文公好贤 / 123
- 三、对贤人的思念 / 126
- 四、刺近小人与警惕伪君子 / 130
- 五、曹国佞人的谀辞 / 134
- 六、君子的赞歌 / 138
- 七、谗人巧言乱国 / 141

第五章 言路篇 / 145

- 一、仁者的忧郁 / 147
- 二、贤士的隐居生活 / 151
- 三、忧国者的悲歌 / 154

篇目索引 / 158

第一章

婚 恋 篇

描

写婚姻恋爱的诗在《诗经》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这类诗主要收集在十五《国风》中。宋朝的朱熹曾经说：“凡收在《国风》中的诗，大多是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是男女互相歌唱，各自表达感情的。”这些诗产生的地区不同，时代也不完全相同，所反映的风俗也不一样。其中大多是当事人大胆而真率的表白，也有一些是对他人婚姻恋爱的批评或希望。凡属描写男女相爱，男女相思，男女相求，男女幽会，以及嫁娶成婚，祈婚祝福，抗婚拒婚，或婚后离弃的，都属于这一类的诗。这类诗除收在《周南》和《召南》中的以外，收在其他十三《国风》中的，大多被古代的经学家看作是“淫诗”或“刺淫”的诗。其实这类诗大多反映了古代男女青年对美好的婚姻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或对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批评和否定，还有些是从自身经历的婚姻悲剧中总结出来的痛苦教训，决不可一律斥为“淫诗”。另一方面，古代经学家对这些诗的解释，也有不少对今人有启发或值得借鉴的地方，也不可一律斥为“封建说教”而加以抹杀。下面我们试就其中的若干诗篇，探讨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